

农政问题：被忽视的学术概念及其传统*

叶敬忠

提要：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成形于1899年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以此为书名出版的著作。围绕这一概念开展的知识考古和学术研究发现，这个原本有着确切含义的学术概念，却在中文学术界被译作“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并未能被充分理解和广泛使用。笔者自2011年将Agrarian Question译为“农政问题”。“农政”是指关于在农地、农业、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涉及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农政问题”这一概念在德语、俄语和英语中有着相互对应的、确定的、无歧义的固定术语表达，且这三种语言的对应术语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使用频率具有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理论脉络和知识传统，学术表达需要遵循规范的逻辑和理路。中文学术界可以在“‘三农’问题”概念的基础上，重拾“农政问题”的概念和传统。

关键词：农政问题 知识考古 学术概念 马克思主义 “三农”问题

一、与“农政问题”概念的相遇

自2007年，我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常常遇到一个英文术语——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其他术语，如农政变迁（Agrarian Change）、农政转型（Agrarian Transition）、农政研究（Agrarian Studies）等。例如，一本知名国际学术期刊的名称是*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自2011年开始国际学术界出版的“小书新作大思想”系列丛书的名称是*Agrarian Change and Peasant Studies*，其中一本的书名便是*Food Regimes and Agrarian Questions*，其他书名也会涉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0&ZD163，主持人：叶敬忠）的阶段性成果。

及上述相关术语；等等。在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的交流讨论或学术会议中，与会者也会频繁提及 Agrarian Question 这一术语。这些学者包括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萨图尼诺·博拉斯（Saturnino M. Borrás Jr.）、俄罗斯莫斯科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提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农政研究中心教授亚历山大·尼库林（Aleksandr Nikulin）、南非西开普大学土地与农政研究所教授本·卡曾斯（Ben Cousins）和加拿大特伦特大学教授阿伽·哈龙·阿克拉姆—洛迪（Agha Haroon Akram-Lodhi）等（叶敬忠，2021a），其中很多学者也是上述“小书新作大思想”系列丛书的作者。我在参与这些国际学者的互动交流时，发现他们围绕 Agrarian Question 等相关主题可以讨论得热火朝天、兴奋不已，而我并不十分明白他们讨论的核心要点，也不清楚这个 Agrarian Question 源自何处以及对应中文学术文献中的哪个术语或理论。为此，我每每尴尬万分、纠结不已。此外，在我的一些英文投稿中，有些审稿专家也会建议论文能够围绕 Agrarian Question 进行集中回应和聚焦讨论，此时我也无法确信是否真正理解了审稿专家的建议。

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我带着这种困惑不断阅读、思考、请教、交流，努力把握 Agrarian Question 以及相关术语的学术含义和历史脉络。这一知识考古式的探索历程充满了激动和兴奋。我常想，这是否就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做出“科学发现”时具有的那种感觉？例如，亨利·伯恩斯坦和萨图尼诺·博拉斯两位教授确认，作为理论问题和学术概念，Agrarian Question 真正成形于 1899 年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出版的著作，该著作以 *The Agrarian Question* 为书名。^①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的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考茨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袖。而我国从事农村经济和社会研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陈翰笙，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留德博士。因此可以推断，陈翰笙的研究也许会受到考茨基的影响，在考茨基那里成型的学术概念 Agrarian Question 也可能会出现在陈翰笙的著作里。带着

^① 该著作以德文撰写，书名为 *Die Agrarfrage*，在英语学术界中被译为 *The Agrarian Question*（Kautsky，1988）。该著作在国内被通译为《土地问题》（考茨基，1955）。我将其译为《农政问题》。

这一猜想，我很快发现，陈翰笙（1984）的中文文献《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在1936年以英文撰写出版时（Chen, 1936），就使用了 Agrarian Question (Problem) 这一概念^①，并将之作为正文每一页都出现的页眉短标题。后来的文献考古发现，1931年陈翰笙在与蔡元培共同主编的“农村经济参考资料”系列（之三）中就推出考茨基 *The Agrarian Question* 一书第五章和第八章的中文翻译，陈翰笙在序言中评价考茨基为“关于资本家社会的农村经济叙述得最具体、分析得最深刻的一位学者”（宗华，1931）。陈翰笙1930年在一篇短文中高度赞扬考茨基的这一著作：“从前考茨基根据可靠的材料，详细分析西欧各国的农村经济，他的那本著作，到现在还是一本最有价值的农村经济参考书，最近二三十年来，还没有像他那样的著作出版”。（1989：40）

在围绕 Agrarian Question 进行文献研读、历史追溯和脉络的梳理过程中，类似的经历多次出现，每一次都会令我更加坚定在此领域继续进一步知识考古的信心。例如，英文术语 Agrarian Question 对应着固定的德文术语 Agrarfrage 和固定的俄文术语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通过对这三种语言的三个术语进行“词频使用”检索发现，结果高度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 Agrarian Question 是学术界的一个固定概念。此外，目前中文文献中考茨基（1955）的《土地问题》、恰亚诺夫（1996）的《农民经济组织》和列宁（1984）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是围绕 Agrarian Question 这个主题进行对话，这说明上述三本著作是学术系谱中的同一个系列，应该摆放在一起。再者，1999年由菲利普·安东尼·奥哈拉（Phillip Anthony O'Hara）主编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将 Agrarian Question 作为政治经济学领域450个词条之一进行阐述（O'Hara, 1999：8；奥哈拉，2009：12），这可以彻底证明，Agrarian Question 就是一个国际通用学术概念。另外，在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我通过重读《江村经济》，发现该著作以英文撰写时正是聚焦了 Agrarian Question (Problem) 这一概念，而且作为“结论”的第十六章，标题便是 Agrarian Problems in China。进一步地研读发现，《江村经济》的学术贡献应该不是如国内学界认为的那样——在人类学方法上的突破、对经济社会学的贡献、对社会变迁研究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推动等，而是采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框架，尝试探索中国

^① 在早期英文文献中，往往出现 Agrarian Question 和 Agrarian Problem 两个术语。我就此与在该领域有长期研究的提奥多·沙宁教授和亨利·伯恩斯坦教授进行了确认，他们认为虽然 Agrarian Question 是后期通用的学术概念，但早期从俄文或从德文译为英文的 Agrarian Problem，是同样的意思。

乡村发展转型的生计框架视角和生计多元化路径，以此对话和回应西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道路选择（叶敬忠，2021a）。可见，《江村经济》应该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围绕国际通用学术概念 Agrarian Question 而研究的重要学术文献。

十余年来围绕 Agrarian Question 而开展的知识考古和学术研究，不仅过程充满惊喜，而且结果正在形成影响。我自2011年将 Agrarian Question 译为“农政问题”，并通过研究发现，“农政问题”第一次由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1899年以书名的形式提出。其历史背景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农政问题”在德国社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内部作为政治问题被提出，后在社会民主党内的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论战中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实体主义^①的论争中作为理论问题被提出，进而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学术概念，成为社会发展中普遍使用的政治和政策话语（Hussain & Tribe, 1981: 72-101; Akram-Lodhi & Kay, 2010）。早期对“农政问题”的学术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和列宁等。因此，“农政问题”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叶敬忠，2022a）。

目前关于“农政问题”知识考古的研究成果已经从对与“农政问题”有密切关联的国内话语“‘三农’问题”的解读（叶敬忠，2018），拓展到对“农政问题”概念演进与理论发展的梳理（叶敬忠，2022a）、对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五大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的总结（叶敬忠、汪淳玉，2018；叶敬忠等，2019；叶敬忠、王丹，2019；叶敬忠、吴存玉，2019；叶敬忠、张明皓，2021）以及农政问题中国传统的分析（叶敬忠，2021a；陈航英，2023；潘璐，2023）等。可以说，在“农政问题”概念被推出之后，围绕“农政问题”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已经逐渐得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认可和采用。

在此情况下，本文希望再次回到这一领域研究的原点，呈现对这一概念的最初考察过程，并澄清与这一概念考察相关的一些疑问。这将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农政问题”概念和相关框架的研究，有利于分析和构建中国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道路。

^① 这里指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研究小农农业的独特性与组织形式、“生存小农”的价值结构与存续性、土地的权利属性与分配合作、村社的独特性与乡村价值的学术理论（黄宗智，2000：2—4）。

二、被中文学术界忽视的概念

农政问题 (Agrarian Question) 是国际学术交流中的一个固定通用概念, 常常作为著作或文章的标题或关键词, 具有确切的含义。然而, 这一国际学术概念在中文学术界, 就如中国的“‘三农’问题”概念在国际学术界的情况一样 (虽然原因并不相同), 认识和传播非常有限 (叶敬忠, 2018)。这与中国学者对 Agrarian Question 的理解和翻译有密切关系。除了我的“农政问题”译法之外, Agrarian Question 在自诞生至今的 126 年时间里, 在国内的学术文献中一直没有被作为固定的学术概念, 未见中文翻译时同时附上英文原文的^①, 而更多是被作为一般性的语言表述进行各不相同的意译。这些意译主要有以下四种:

(1) “土地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译法, 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很多文献中的重要概念 Agrarian Question 均被译为“土地问题”。最为典型的是, 考茨基代表作 *The Agrarian Question* 的中文版是《土地问题》(考茨基, 1955; Kautsky, 1988)^②。英文版《列宁全集》第 40 卷的列宁笔记合集 *Notebooks on the Agrarian Question*, 在中文文献里对应的是中文版《列宁全集》第 56 卷的《土地问题笔记》(Lenin, 1968a; 列宁, 1990)^③。英文版《列宁全集》中文章标题里出现的 Agrarian Question, 在中文版中对应的是“土地问题”^④。但问题是, 英文版《列宁全集》中也常有文章标题包含 Land Question 的情况, 而在中文版中也对应着“土地问题。”^⑤此外, 《江村经济》中文版是从英文版翻译而来, 英文版第十六章标题中的 Agrarian

① 在目前已经检索和阅读的其他学者的文献中, 我尚未见到在中文表述后附上英文 Agrarian Question 的, 但也许由于阅读有限, 存在遗漏情况。

② 关于考茨基代表作 *The Agrarian Question*, 在中文界, 蔡元培、陈翰笙早在 1931 年推介考茨基《农政问题》的两个章节, 由宗华从德文版翻译 (宗华, 1931)。1936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土地问题》(考茨基, 1936), 后经修订, 于 1955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考茨基, 1955)。这个唯一的中文全译本是从俄文版翻译过来的, 译者是云南白族俄语翻译家、社会学家赵济。1936 年版的译者岑纪是赵济的曾用名, 1955 年版的译者梁琳是其笔名。

③ 需要说明的是, 中文版《列宁全集》显然并非译自英文版, 而是译自俄文版。

④ 例如, (1) 英文文章“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the ‘Critics of Marx’”对应的中文版是《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Lenin, 1968b; 列宁, 1984a), (2) 英文文章“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Russia”对应的中文版是《俄国的土地问题》(Lenin, 1968c; 列宁, 1984b)。

⑤ 例如, 英文版《列宁全集》第 10 卷中有两篇文章的标题分别是: “The Land Question in the Duma”和“The Land Question and the Fight for Freedom”, 对应的中文版《列宁全集》第 13 卷中的这两篇文章分别是《杜马中的土地问题》和《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Lenin, 1968d; 列宁, 1984c)。

Problems, 在中文版中被译为“土地问题”(Fei, 1939: 282; 费孝通, 2012: 249)。

(2) “农业问题”。中文文献中第二种常见译法是将 Agrarian Question 译为“农业问题”。例如, 将 Agrarian Question 列为 450 个重要政治经济学概念之一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 在英文版基础上翻译而成的中文版便将该词条译为“农业问题”(奥哈拉, 2009: 12)。在上述考茨基的代表作中, 作为书名和正文中出现的几处 Agrarian Question, 对应着中文版中的“土地问题”, 而另外几处则对应着中文版中的“农业问题”(Kautsky, 1988: 1—2; 考茨基, 1955: 5—7)。在恰亚诺夫的代表作《农民经济组织》中, 作者提及俄国教授科辛斯基(Kossinskii)和马斯洛夫(Maslov)在 20 世纪头几年撰写的著作, 书名对应的英文均为 *The Agrarian Question*^①, 这显然是为了与考茨基的代表作进行对话, 而这两本书的书名在中文版中均为《农业问题》(Chayanov, 1966: 39、237; 恰亚诺夫, 1966: 6、234)^②。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于 2008 年出版的著作《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将奥斯卡·哈曼(Oscar Hammen)的一篇著名英文论文标题中的 Agrarian Question 译为“农业问题”(Harmmen, 1972; 哈曼, 2008: 35)。此外, 据了解, 在日语和韩语中, Agrarian Question 也均被译为“农业问题”^③。

(3) “农村问题”。部分中文文献将 Agrarian Question 译为“农村问题”。例如, 上述《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将提奥多·沙宁与和田春树(Haruki Wada)^④的两篇著名英文论文标题中的 Agrarian Question 译为“农村问题”, 正文中也有这样的译法(Shanin, 1981; Wada, 1981; 春木棉, 2008: 68; 沙宁, 2008: 99)。此外, 前文提及的陈翰笙的那部英文著作翻译为中文版时, 也有这样的译法(Chen, 1936: xvii; 陈翰笙, 1984: 12)。

(4) “农民问题”。在中文文献中, 也可见将 Agrarian Question 译为“农民问题”的情况。例如,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将奥斯卡·哈曼的英文论文标题中的

① 这两本著作中的其中一本, 英文版第 237 页出现的书名为 *The Agrarian Question*, 第 39 页出现的书名为 *On the Agrarian Problem*; 另一本的书名出现在第 39 页, 为 *The Agrarian Problem*。如前所述, Agrarian Question 是后期通用的学术概念, 早期从俄文或从德文译为英文的 Agrarian Problem, 是同样的意思。

② 显然, 中文版《农民经济组织》并非译自英文版, 而是译自俄文版。

③ 据日本京都大学秋津元辉(Motoki Akitsu)教授 2024 年 9 月 26 日邮件确认, Agrarian Question 在日语中被译为“農業問題”, 即“农业问题”。据韩国高丽大学金喆奎教授(Chul-Kyoo Kim)2024 年 9 月 28 日邮件确认, Agrarian Question 在韩语中被译为 농업문제, 即“农业问题”。

④ 在该书中, 该学者被译为春木棉。

Agrarian Question 译为“农业问题”，但正文中多处将之译为“农民问题”（Harmmen, 1972；哈曼，2008：39—41、51、54、64）。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部分文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早期著作，其中文版有些是从德文版或俄文版翻译过来的，因此不排除存在德文、俄文、英文、中文之间互译时出现含义偏差的可能。前面列出的对应英文术语 Agrarian Question 的几种中文表达方式，并非全部是从英文文献直接翻译而来。然而，即便是从英文文献直接翻译成中文的，甚至在同一部著作中，也常常出现各不相同的译法。例如，前面提及的陈翰笙 1936 年的那本英文著作将 Agrarian Question (Problem) 作为正文每一页都出现的页眉短标题^①，虽然 1984 年完成的中文译版并没有翻译此短标题，但在正文中，该概念被译为“土地问题”（Chen, 1936: viii；陈翰笙，1984：2）、“农村问题”（Chen, 1936: xvii；陈翰笙，1984：12）或“农业问题”（Chen, 1936: 18；陈翰笙，1984：21）。再如，2008 年出版的《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将英文文献中的 Agrarian Question 译为“土地问题”（Sering, 1984: 68；泽林，2008：267）、“农民问题”（Harmmen, 1972；哈曼，2008：39—41、51、54、64）、“农业问题”（Harmmen, 1972；哈曼，2008：35）或“农村问题”（Harmmen, 1972；Shanin, 1981；Wada, 1981；春木棉，2008：68；哈曼，2008：55，63；沙宁，2008：99）。

虽然翻译可以根据具体文本情境灵活把握，但是一个具有确定内涵的学术概念，若翻译的随意性太大，则无法在新的语言系统中成为通用的学术概念。因此，Agrarian Question 在中文中未能形成对应的固定概念。

第一，无论将 Agrarian Question 译为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这些日常性的语言表达均很难具有学术概念般的确切意义。例如，“土地问题”在日常话语中往往会被想象为技术方面的问题，当然也可以被理解为有关土地的管理、权属或政策的问题。“农业问题”更容易被直接理解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问题，或泛指农业作为一个行业或部门面临或存在的任何问题。因此，这类过于淡化而宽泛的中文表述，其实缺乏实质性的含义。

第二，选择上述四种译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令读者以为 Agrarian Question 主要聚焦的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中的某个方面。只要认真研读考茨基的那部被译为《土地问题》的著作（考茨基，1955；Kautsky, 1988），或

^① 页眉短标题是 Agrarian Problems in Southernmost China。

《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中被译为“农业问题”的词条（O' Hara, 1999: 8; 奥哈拉, 2009: 12），或《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奥斯卡·哈曼的那篇被译为“马克思与农业问题”的著名学术论文（Harmmen, 1972; 哈曼, 2008: 35），或陈翰笙的《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Chen, 1936; 陈翰笙, 1984），或以 Agrarian Question 为标题或主题的任何文献，都会发现这些文献的重点，并不专注于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的某一方面，而是与这些方面有关的整体性的资本主义发展或现代化发展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关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的全方位结构转型问题。

对于考茨基被译为《土地问题》（*The Agrarian Question*）的著作来说，其包括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均有一个标题，而最为重要的内容——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第一部分的标题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apitalist Society*）^①。即使就整部著作来说，其重点论述的也是农业生产方式、农民分化与无产阶级化、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村治理与动员等方面。

列宁认为考茨基的这部著作是《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而在其之前，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一部系统考察农业资本主义的著作，正是考茨基这部著作中的第一部分——“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填补了这个空白（列宁, 1984d: 79）。就在考茨基这部著作出版那一年（1899年）的年初，列宁刚刚完成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对农业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内容成为列宁专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前半部分，也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列宁的这一研究与考茨基的研究，无论是在分析方法方面还是在政治立场方面，均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对农业和农村社会之影响研究的重要成果（Shanin, 1990: 252）。可以说，他们的这两项研究是针对完全相同的主题而进行的可以相互对话的研究。

1899年1月30日（2月11日）^②，列宁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定稿（列宁, 1984e: 587）。他在1899年3月17日（29日）为该著作付印撰写第一版序言的附言中指出，最大的遗憾是该书未能使用考茨基在其著作（*The Agrarian Question*）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所作的精辟分析^③，因为收到考茨基

① 中文版译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村经济的发展》（考茨基, 1955）。此外，本书的德文版共450页，这一部分占300页。

② 正文中为俄历日期，括号内为公历日期，下同。

③ 列宁的遗憾可能包括对 Agrarian Question 概念的使用，见下文的分析。

的那部最值得注意的杰作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大部分已经排版好（列宁，1984e：6，589）。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列宁在1899年初阅读考茨基的 *The Agrarian Question* 之前，从未使用过 *Agrarian Question* 这一概念，包括在与考茨基的研究主题完全相同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未使用这一概念。

1899年3月下旬，列宁撰写了对考茨基 *The Agrarian Question* 的书评（列宁，1984d：79），此后对该著作多次进行评论和讨论。除了书评文章之外，1899年底，列宁在其撰写的《我们党的纲领草案》正文中第一次使用 *Agrarian Question* 这一概念（Lenin，1968e：242；列宁，1984d：197）。1901年6月，列宁第一次在文章标题中使用 *Agrarian Question* 这一概念（Lenin，1968b：103；列宁，1984a：84）。^① 在此之后，*Agrarian Question* 这一概念在列宁的著作和文章的标题或正文中被频繁使用。

然而，列宁写于1896年8月至1897年3月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和1897年8月至9月的《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等文章，在1908年初再次以文集形式出版时，便取名 *The Agrarian Question*，中文被译为《土地问题》。其中，《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的资料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被大量使用（Lenin，1968f：547，559；列宁，1984f：489，495）。由此可以认为，若列宁在更早时候读到考茨基的著作或了解考茨基的 *Agrarian Question* 概念，则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可能在标题中使用这一概念。而对这些主题和内容的分析与讨论，若译为中文的“土地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

可见，所有以 *Agrarian Question* 为主题的著作均非平常意义上的土地、农业、农村或农民某个方面的专著，而是关于资本主义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有关农业、农村、农民或土地的整体性发展与结构转型问题的研究/专著。

第三，在学术概念 *Agrarian Question* 被译为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的英文文献中，频繁出现中文“土地”“农业”“农村”或“农民”对应的常规英文词汇 *land*、*agriculture/agricultural*、*countryside/rural* 或 *peasant/farmer*。而且，列宁文章的英文版以 *Land Question* 对应中文版的“土地问题”，其《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的英文版以 *Agricultural Question* 对应中文版的“农业

^① 即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the “Critics of Marx”*，中文版译为《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问题”（Lenin, 1968g: 183；列宁, 1984a: 213）；恩格斯文章英文版以 Peasant Question 对应中文的“农民问题”（Engels, 1950；恩格斯, 2009: 507）；等等。可见, Agrarian Question 并不应该被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

上述回顾揭示了中文学术界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现实, 即在 Agrarian Question 提出 126 年之后的今天, 中文学术界仍然未能完全认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国际学术界已经被广泛使用且有深厚积累的固定学术概念。虽然中国学者对相关的国际学术文献有所涉猎, 但在使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常常是一种随意性的日常话语表述, 未能发展出恰当的中文对应概念。

造成这一严肃现实的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 Agrarian Question 之所以常常被译为“土地问题”, 或是因为在讨论农业、农民和农村之前, 关于土地的讨论已经是中国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最大的论题之一。孙中山生前非常重视土地问题, 指出土地是近代各国都关注的问题, 且土地问题不解决, 民生问题也谈不上。其逝世后, 孙科发起成立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将土地问题列为十大研究主题之首（张清勇, 2014: 160—161）。也正是中山文化教育馆组织了考茨基代表作 *The Agrarian Question* 的翻译工作。这是该书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书名被译为《土地问题》（考茨基, 1936）。在民国时代的学术界, 虽然土地问题非常重要、非常关键, 但对土地问题研究的理论视角更多还是古典经济学, 形成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土地经济学, 对那个时代的土地行政、地政运动和土地政策产生了影响（张清勇, 2014: 2）。虽然民国时期的很多机构研究土地问题是为了追随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 但是孙中山的土地思想其实也是受到了列宁的影响。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 Agrarian Question 概念远远超出了土地的范畴, 比古典经济学的视野更为宏大, 追求的是对现代化发展的生产转型和社会形态变迁的解读。但是, 基于中国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在那个时代将 Agrarian Question 译为中文的“土地问题”, 也可以说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此外, 陈翰笙等马克思主义者也沿用了“土地问题”这一译法, 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因此, 对于 Agrarian Question 的翻译和理解必须严肃对待, 否则中国的“涉农研究”不仅难以有机地对接世界, 而且很难有效地联结学术传统, 也无法充分借鉴和对话百余年间国际学术界围绕“农政问题”而广泛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对话的其他理论思潮。正因如此, 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开始使用的“‘三农’问题”概念和围绕“‘三农’问题”的社会研究似乎从空白开始，未能接续涉农主题的国际学术研究，也未能联结相关主题的学术历史（叶敬忠，2018）。为此，中文学术界需要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学术传统中 Agrarian Question 的含义、使用以及在中文语境里的对应概念和理论建设。

三、“农政问题”的概念使用

在2011年翻译出版伯恩斯坦教授的《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Class Dynamics of Agrarian Change*）时，我与作者深入讨论了 agrarian 的含义和翻译。据文献考证，agrarian 这一英文词语最早出现在1593年。词汇使用频率数据检索结果表明，该词语的使用频率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缓慢增加，但真正的快速传播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并于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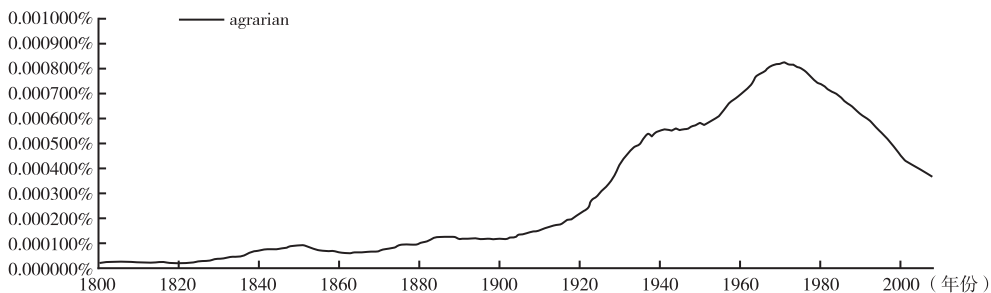


图1 英文词语 agrarian 的使用频率 (1800—2008)

注：横轴指时间段，纵轴指某时间段内该词汇在已扫描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图2—4同）。

数据来源：<https://books.google.com/ngrams>（图2—4同）。

总的来说，英语词汇 agrarian 来源于拉丁语词汇 *ager*，后者指田地（field）的意思。经不断扩展，agrarian 的含义可以指与农村和农业有关的许多方面。具体包括以下6点。

(1) 农地（的）：虽然有时使用一般意义上的“土地”（land）来解释，但主要指关于农地（farmland）、田地（field）、耕地（cultivated land）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属或所有制性质（占有、分配、使用、权利等）。

(2) 农业（的）：关于农地耕种（cultivation of field/land）、耕作（farming）、

农业 (agriculture)。

(3) 农民 (的): 关于从事农业耕种的农民、农民群体特点、农民生活方式。

(4) 农村 (的): 关于以农业为主要生计基础的地方, 即农村或农村地区 (rural, rural area)。

(5) 支农 (的)、支农者: 关于倡导和支持农业利益、农民利益和土地平均分配或重新分配, 或从事这些行动的人。

(6) 农政 (的): 这个意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 指关于在农地、农业、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涉及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 如农政问题 (Agrarian Question)、农政变迁 (Agrarian Change)、农政转型 (Agrarian Transition) 等^①。

这意味着, 在马克思主义以及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学术文献中, 英文词汇 agrarian 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农地 (的)、农业 (的)、农民 (的) 或农村 (的), 而是农政 (的)。因此, 2011 年笔者第一次将 agrarian 译为“农政”, 因为在伯恩斯坦教授著作的历史和学术背景下, 使用“土地”“农业”“农民”或“农村”等中文词汇均无法表达其真正含义。这一翻译灵感来自《农政全书》的“农政”二字, 因为其所含有的涉农事务以及关涉政府政策的意涵 (伯恩斯坦, 2011: 7)。但是, 这并不是说《农政全书》中的“农政”一词直接对应着国际文献中的 agrarian, 更不是将《农政全书》中的“农政”二字作为 agrarian 中文翻译的佐证。

虽然我借用了《农政全书》中的“农政”一词作为 agrarian 的中文翻译, 但作为对应马克思主义传统里 Agrarian Question 中的 agrarian 一词, “农政”的具体所指的是: “农”包括农地、农业、农民和农村四个方面, “政”则主要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与政策之意义上的“政”。在我看来, agrarian 的“农政”之意和 Agrarian Question 的“农政问题”之概念,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农地、农业、农村和农民研究的核心话语, 且可以主要归为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学科范畴 (叶敬忠, 2018, 2021, 2022)。尤其需要说明的是,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随之发展出来的大量学术讨论和学术文献里, agrarian 的这一“农政”之译

^① 这些总结还得益于俄罗斯莫斯科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提奥多·沙宁 2016 年 10 月 25 日的邮件、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亨利·伯恩斯坦 2018 年 2 月 17 日和 18 日的邮件、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萨图尼诺·博拉斯 2018 年 2 月 17 日的邮件、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农政研究中心教授亚历山大·尼库林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邮件。另参考了英文词典、英汉词典等。

法和含义，都是在 Agrarian Question “农政问题”这一整体概念背景下进行讨论和使用的。也就是说，这一“农政”意涵更多是在表达“农政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如“农政转型”“农政变迁”等概念，而非独立地使用。

尽管如此，作为学术概念的知识考古和文献考究，本文还需要对中文界已经零星使用过的“农政”一词进一步说明，这是为了更全面而准确地地区分马克思主义传统里 agrarian 的“农政”含义和已有中文文献中少量使用的“农政”一词的含义。此前已有学者在少数情况下使用过“农政”概念，但其语意与马克思主义传统里 agrarian 之“农政”含义相去甚远。对他们来说，“农政”主要指农业政体、农业政策或农业行政。例如，“农政”是指中国历史上以农为本或以土地为本的统治方略和政治理想（王立杰，2011）；或指为了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而采取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叶依能，1998；彭南生，1999），是很多政策法规构成的综合农业政策体系（方海洋，1996）；或直接指政府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陈志刚，2012）。此外，李文学（2009：1—4）出版了三卷本《当代中国农政论》，虽然他并未对书中的“农政”概念做出界定，但基于内容可以判断的是，其“农政”指的是有关中国“三农”政策的调研、思考、评论或研究，目的在于为“三农”提供咨政服务。再者，在民国时期，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中国的农业高等教育还开设过“农政学”类课程，出版过“农政学”教材，但那时的“农政学”指的是“农业政策学”（许璇，1912；钟甫宁，2000；川田稔、郭连友，2008）。

值得注意的是，李典军对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农业思想颇有研究，并出版了《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史研究》《国外社会主义农政思想史》等系列专著。遗憾的是，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政”之意和“农政问题”概念与他的这些研究擦肩而过。李典军（2007：3）认为，“农政”的本义是“农民之事的治理与服务”，与农民相关的农事、乡村之业或通常所说的农业、农村之事也纳入其中，因此涵盖农民、农业和农村，与“三农”的语义相近或更为宽泛。李典军以此分析了苏联、美国以及诸如古巴、朝鲜、越南与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政思想、农政模式、农政道路以及其中的政权主体、农民群体、农民精英、农政使者和农政官员的互动关系（李典军，2004：391；2007：8；李典军、李泽丰，2009：5）。可见，李典军所讨论的主题大多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研究范畴（李典军，2003：1—2；李典军、李泽丰，2009：1—4），但与马克思主义的“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研究传统未能有机对接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Agrarian Question 这一概念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意涵。它是指，为了建立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农业生产方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是否以及如何发生哪些转型和变化，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动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转型和发展（叶敬忠，2022a）。虽然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些许调整和变化，但其学术传统和理论脉络是固定的。1899年，考茨基的《农政问题》以德语出版，即“农政问题”这一概念首先用德语提出，并随即在德语、俄语和英语中有了相互对应的、确定的、无歧义的固定术语表达，分别是 Agrarfrage（德语）、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俄语）和 Agrarian Question（英语）^①。词汇使用频率数据检索显示，“农政问题”的德语、俄语和英语对应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且与 agrarian 的使用频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均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快速增加（见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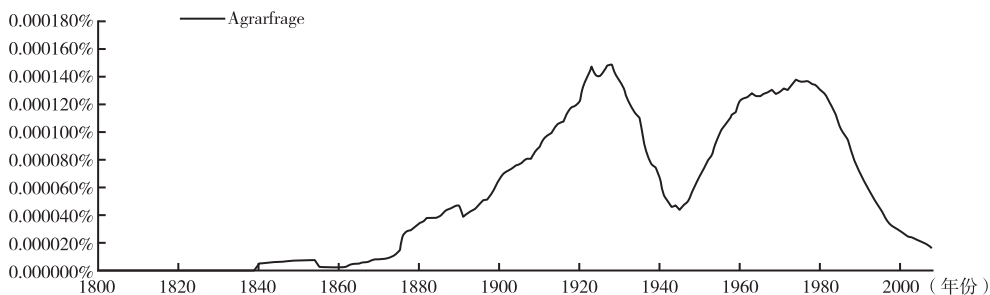


图2 “农政问题”的德文 Agrarfrage 的使用频率（1800—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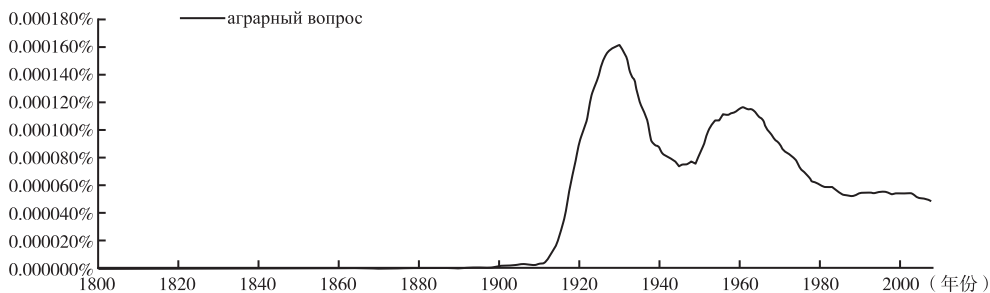


图3 “农政问题”的俄文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的使用频率（1800—2008）

^① 该结论得到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农政研究中心亚历山大·尼库林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亨利·伯恩斯坦教授、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农村社会学系杨·杜威·范德普勒格教授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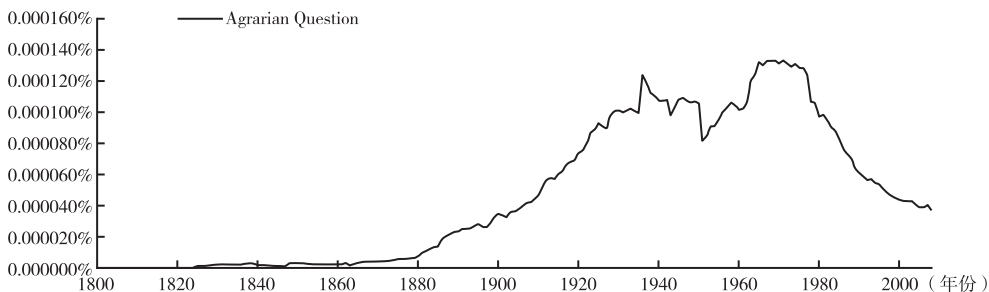


图4 “农政问题”的英文 Agrarian Question 的使用频率 (1800—2008)

对图2—4展示的词汇使用频率检索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初步看出世界范围内围绕“农政问题”而出现的政治发展和学术思潮的变化与特点。这些变化和特点包括:

(1) agrarian 这一词汇的实际使用主要伴随“农政问题”概念的使用而得到扩展。

(2) 德国社会在19世纪最后20年(尤其是最后10年),在社会民主党内就作为政治方向选择的“农政问题”做了激烈的大辩论,很多文章在《新时代》等杂志上发表(Hussain and Tribe, 1981: 100; 王长江, 1986),因此这一话语在19世纪末的德语中有较高的使用频率。

(3) “农政问题”对应的俄语概念的使用在1920年前后约20年时间内增速迅猛,这与十月革命之后关于“农政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和农业实体主义大论辩有密切关联(叶敬忠, 张明皓, 2021)。

(4) 20世纪40—50年代,“农政问题”概念无论是在德语还是在俄语或英语中,均有一段显著回落期(后又继续回升),其中德语最甚,俄语次之,这或许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导致学术出版减少有关。

(5) 自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农政问题”还是“农政”概念的使用,均有较大幅度减少,这主要是因为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盛行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式微。

(6) 对于“农政问题”这一概念的未来走向,就国际学术界目前关注和研究的主题来看,有重拾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趋势,即相关概念的使用频率或大幅回升。

四、重拾“农政问题”

前面的分析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里的固定概念 Agrarian Question，在中文学术界尚无对应的中文概念，也因此没有被中文学术界认识、理解和使用。这是中文学术界必须面对且必须解决的学术问题。我将之译为“农政问题”，其中的“农政”有具体而明确的所指。虽然中文学术界此前已有零星使用“农政”一词的情况，但其对应的都不是 Agrarian Question 中 agrarian 的意涵。

为了理解“农政问题”的深刻含义，必须对此概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古和梳理。在此方面，我本人以及其他学者已经开展了十余年的探索和研究工作，相关成果也有一定的发表。随着学界对此概念讨论和争鸣的不断推进，“农政问题”或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和框架得以广泛使用，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对应英文 Agrarian Question 的固定的、整体性的中文学术概念。在此情况下，对“农政问题”的理解和使用既不会受到已有中文使用的“农政”意涵的影响，也可以更好地区别于业已定型的一般意义上的“‘三农’问题”之概念。

我的研究指出，在中文术语中，与“农政问题”可以建立起紧密关联的是“‘三农’问题”。中国社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普遍使用的“‘三农’问题”话语对引起全社会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被频繁用于社会讨论或政策文本之中，是大众化和通俗化的社会和政策术语。但是，若将“‘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学术话语，其概念界定并不明确，理论体系并不清晰，国际对话并不通畅（叶敬忠，2018）。因此，中国的“涉农”社会研究可以在多年来“‘三农’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转向“农政问题”这一概念和框架（叶敬忠，2022a）。

然而，也常有学者提出，“‘三农’问题”概念已经使用多年，不能被代替或取消，因为农业、农村和农民还需要社会关注；“‘三农’问题”是本土的，本土概念很好。其实，我的观点非常明确，从“‘三农’问题”到“农政问题”的学术话语转向并非否定社会科学本土概念的重要性，也非一味将西方概念生搬硬套在中国的现实之上（叶敬忠，2022a）。例如，在社会倡导和政策话语中，我们可以继续使用“‘三农’问题”概念。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其实是实现学术发展的统一体，不存在对立或排斥的关系。没有国际化的本土

化只能算是自说自话，而没有本土化的国际化则是不说自己话。因此，关于社会研究国际化还是本土化的论争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叶敬忠，2022b）。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基于对国内“‘三农’问题”的概念分析和对国际“农政问题”的知识考古，在学术研究中，转向“农政问题”概念框架将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借鉴和拓展其他理论发展成果，且有利于对话国际学术界，有利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此外，围绕“农政问题”的知识考古还涉及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基本定位，即重视知识传统和脉络逻辑。2020年10月22日，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次讲座上指出，“现今有些学术研究与民间议论没什么两样，对知识生产没有什么贡献”。^①我深以为然，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强调理论脉络和知识传统，学者表达更需要逻辑和理路，而不是随意为之。

在当今社会，我们一点也不缺少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发表观点和看法的人，一点也不缺少对未来走向和未来道路提出判断和预测的人。以涉农领域为例，农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是现代农业大生产还是小农农业小生产，未来农业走资本集约型道路还是家庭经营型道路？农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权属安排，承包权与经营权统一还是分离，未来农地自由流转还是有限度流转？农民应该如何实现社会流动，外出务工还是留守乡村，未来农民入户城镇还是留居乡村？农村应该如何治理，自然虚空还是现代振兴，未来农村应该别具农业性和乡村性还是委身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关于这些问题的各种说法、各种提法，无论是在传统主流媒体还是在现代自媒体上，每日都热闹非凡、层出不穷。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这是全社会高度自信、开放和包容的体现。然而，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讨论的角度和逻辑应该有所区别。^②

例如，官员可以表达对政策的解读，农民（及其他群体）可以表达需求和期望。但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学术讨论最应该忌讳的就是立场先行。然而，目前的现实是，一些学者的讨论基本停留在想当然和朴素的层面，看不出任何理论

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官网. 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2020年秋季学期第3讲（总第90讲）——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的变迁》. http://cohd.cau.edu.cn/art/2020/10/19/art_47957_932362.html. 2020年10月19日。

② 新京报客户端. 乡村圆桌：理解乡村振兴 学者不能想当然.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55877636915256.html>. 2019年5月25日。

脉络和学术逻辑。其实，社会科学的精髓未必在于发明创造，而在于对理论脉络的梳理和知识传统的累积，在于对现实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社会科学学者的看法和观点，必须有深厚的理论脉络和知识传统作为基础，任何分析和研究，都应当有严谨的学术逻辑和方法体系作为支撑。对上述涉及农业生产方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治理等问题的讨论，需要建立在全面而坚实的理论脉络、知识传统、学术逻辑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而在这些方面，“农政问题”概念和理论框架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成果和实践方法。因此，我们十分需要对“农政问题”进行知识考古，需要重拾“农政问题”的理论传统，并联结中国的学术研究予以发展。

但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尚未充分认识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的“农政问题”研究传统，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只是城市、工厂和工人阶级，而忽略农业、农民等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识。实际上，农政问题，尤其是农业和农民的问题，一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注和研究的核心议题（Hussain & Tribe, 1981: viii；周凡，2008: 1）。对中国来说，在乡村发展与转型变迁领域，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抑或是乡村振兴战略，都是为了探索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成功转型路径。对此，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的概念和框架。研究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无法回避对农政问题的讨论和解决，都必须找寻适当的农政转型路径，必须成功地完成农政转型（叶敬忠，2021a）。若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问题，则常常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或解决好其农政问题，没有顺利完成农政转型（叶敬忠，2021b）。在国际学术界，已有共识的农政转型道路包括英格兰式、普鲁士式、美国式、东亚式（包括日本式、韩国式）道路（Byres, 1996: 23—26）。围绕“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的研究已经形成五大理论视角，即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这些理论视角构成了乡村发展与转型研究的理论传统。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涉农社会研究应该主动回应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在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的理论传统指导下，充分汲取其他理论传统的优势元素，借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政研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乡村发展与转型的中国理论，探索农政转型的中国式道路，向世界讲好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故事。

参考文献：

- 奥哈拉主编，2009，《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上卷），郭庆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伯恩斯坦，亨利，2011，《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译，叶敬忠译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陈翰笙，1984，《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冯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9，《关于保定农村调查的一些认识》，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 陈航英，2023，《早期中国农政研究探析——以陈翰笙为中心》，《开放时代》第4期。
- 陈志刚，2012，《再说江南农业生产的内卷型商业化与边缘化——以明中后期政府的农政管理体制为中心》，《东岳论丛》第5期。
- 川田稔、郭连友，2008，《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构想》，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春木棉，2008，《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农村问题（二）：马克思与俄国革命》，王新生译，何增科、周凡主编《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重庆：重庆出版社。
- 恩格斯，2009，《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方海洋，1996，《如何理解日本的农政——与周明俊、吴尚民、孙新三同志商榷》，《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 费孝通，2012，《江村经济》，戴可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哈曼，奥斯卡，2008，《马克思主义与农业问题》，张双利译，何增科、周凡主编《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重庆：重庆出版社。
- 黄宗智，2000，《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 考茨基，1936，《土地问题》（上、下卷），岑纪译，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55，《土地问题》，梁琳译，北京：三联书店。
- 李典军，2003，《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史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2004，《美国农政道路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2007，《苏联农政模式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李典军、李泽丰，2009，《国外社会主义农政思想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李文学，2009，《当代中国农政系论》（第一、二、三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列宁，1984，《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84a，《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84b，《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84c，《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84d，《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84e，《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84f，《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0，《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潘璐, 2023, 《农政问题: 中国本土化传承与探索》, 《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 彭南生, 1999, 《清末农政改革述评》, 《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
- 恰亚诺夫, A., 1996, 《农民经济组织》, 萧正洪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沙宁, 提奥多, 2008,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农村问题(一): 马克思与农民公社》, 王新生译, 何增科、周凡主编《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重庆: 重庆出版社。
- 王立杰, 2011, 《农政的精髓》, 《中国企业家》第23期。
- 王长江, 1986, 《考茨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问题争论》,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期。
- 许璇, 1912, 《农政学讲义》, 北京: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 叶敬忠, 2018, 《“三农问题”: 被夸大的学术概念及其局限》, 《东南学术》第5期。
- 2021a, 《〈江村经济〉: 中国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 《社会》第3期。
- 2021b,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脱贫地区内的衔接抑或发展时代间的转型》, 《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 2022a, 《农政问题: 概念演进与理论发展》,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2022b, 《新发展社会学的想象》, 《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 叶敬忠、贺聪志、许惠娇, 2019, 《生计框架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叶敬忠、汪淳玉, 2018, 《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叶敬忠、王丹, 2019, 《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叶敬忠、吴存玉, 2019,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叶敬忠、张明皓, 2021, 《恰亚诺夫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开放时代》第3期。
- 叶依能, 1998, 《南北朝时期农政概述》, 《古今农业》第4期。
- 泽林, 马克斯, 2008, 《土地问题与社会主义》, 程光德译, 何增科、周凡主编《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重庆: 重庆出版社。
- 张清勇, 2014, 《中国土地经济学的兴起(1925—1949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钟甫宁, 2000, 《农业政策学》,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 周凡, 2008, 《导论: 激进政治视域中的农业与农民问题》, 何增科、周凡主编《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重庆: 重庆出版社。
- 宗华, 1931, 《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三)》, 蔡元培、陈翰笙编,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 Akram-Lodhi, A. H. & C. Kay 2010, “Surveying the Agrarian Question (part 1): Unearthing Foundations, Exploring Diversit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7(1).
- Byres, T. J. 1996, *Capitalism From Above and Capitalism From Below: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hayanov, A. V. 1966,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D. Thorner, B.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eds.), Homewood, Illinois: Irwin.
- Chen, Han-Seng 1936,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Engels, F. 1950, “The Peasant Question in France and Germany.” In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3)*.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First published in 1894.
- Fei, Hsiao-Tung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 LTD.
- Harmmen, O. J. 1972,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7(3).
- Hussain, A. & K. Tribe 1981,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Volume 1):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Peasantry 1890 – 1907.*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Kautsky, K. 1988, *The Agrarian Question (2 vols)*. London: Zwan.
- Lenin, V. I. 1968a,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40)*.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968b,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5)*.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968c,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0)*.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968d,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10)*.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968e,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4)*.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968f,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968g,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1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O'Hara, P. A. (ed.) 1999,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ering, M. 1984,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Socialism.” In A. Hussain and K. Tribe (eds).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Capitalist Agriculture: Readings from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891 – 1999.* Translations by Ben Fowkes.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Shanin, T. 1981, “Marx,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 Marx and the Peasant Commune.” *Historical Workshop Journal* 12(1).
- 1990. , *Defining Peasants: Essays Concerning Rural Societies, Expolary Economies, and Learning from The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Wada, H. 1981, “Marx,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I Marx and Revolutionary Russia.” *Historical Workshop Journal* (12).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张书琬